

從士大夫到外交官的轉變：由汪大燮的經歷 看清末民初外交官形成的一種模式*

李文杰**

本文詳述汪大燮在晚清二十年的史事，藉由制度變局中汪大燮的仕途發展及其心路歷程，探討科舉制度之下外交官成長的經歷。汪大燮以舉人出身，捐納內閣中書，為求仕途發展，考取總理衙門章京，一路在總理衙門、外務部遷轉，依託總理衙門章京及外務部丞、參制度，積累交涉經驗，由外務部司官、駐外公使，最終升任外務部侍郎，成為清末民初最早一批近代外交官。其國家觀念，也由早期的忠君事主，逐漸轉變為支持憲政、國家利益至上等觀念的集合體。汪大燮的這種發展路徑，與清末民初接受新式外語、法律訓練，進而進入外交界服務的職業外交官不同。由士大夫轉型為外交官，是近代外交官形成的模式之一。

關鍵詞：汪大燮、外交、總理衙門、外務部、科舉制度

* 本文為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清總理衙門、外務部年表整理與職官群體研究」(項目批准號：12YJC770032)之成果，並受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和上海市教育發展基金會「晨光計畫」項目「晚清駐外外交官群體研究」(項目編號：12CG26)之資助。

**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員。
聯絡地址：200241上海市閘行區東川路500號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No. 500, Dongchuan Rd., Minxing Dist., Shanghai City 200241, China)。

一、前言

如果從今天的眼光來反觀明清科舉制度下造就的士大夫，我們看到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淡化專業。傳統科舉制度，引導士子讀聖賢詩書、練習帖括、發揚正學。經由科舉考試脫穎而出的士子，進入官僚體制，以其所學導引四民，以求以有資於世道。聖賢詩書，重在講求道德人心及為政、做事的大原則，又推崇「君子不器」，不鼓勵士子拘泥於一才一藝，作專精深入的研究。從客觀需要而言，傳統政治講求「政簡刑清」，除刑名錢穀，也不涉及過多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這些因素導致的結果，是科舉正途出身的官員，不嫻於自己的業務。以清代中央六部為例，官員分為堂官（尚書、侍郎）、司官（郎中、員外郎、主事）兩級。經由科考選拔的進士，以「掣籤」的方式，進入其中某部某司，成為最低一級的司官——主事，而後逐級上升，外放道、府，晉升京堂或考選御史。這種「掣籤」是隨機的，當然也就談不上專業對口。¹而堂官，則更是不拘專長。他們的任職軌跡，往往遍歷六部，且有事則互相兼署。因此，他們不得不將具體事務交由書吏去辦。書吏沒有功名、不入流，也就缺乏名教的約束，因此敢於利用職務之便，行「需索之計」。²

書吏辦事的弊端，人們當然能看得到，但這種辦事制度代代相因而沒有徹底改變，自有其存在的緣由。也有人提出過相應的對策，例如，科舉考試的內容不拘四書五經，而另外增設專科；或者讓官員久任其職。這樣，科舉出身的士人可親自理事，而無需假手地位品行低下的書吏。³這些建策動機固然好，在傳統制度中卻行不通：首先，科舉設立專科，無異誘導士

¹ 清制，「新科進士引見奉旨以部屬用者，掣籤分派六部，在額外主事上學習辦事，俟三年期滿，該堂官秉公覈實，分別帶領引見。如果熟諳部務，即奏留本部，以主事用。」錫珍等撰，《欽定吏部銓選則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750冊，頁405。

² 吳觀禮，〈翰林院編修吳觀禮摺〉，收入王雲五主持，《道咸同光四朝奏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第8冊，頁3494。

³ 惠善，〈鑲藍旗漢軍公中佐領惠善摺〉，收入王雲五主持，《道咸同光四朝奏議》第8冊，頁3442。

子「奔競」旁門，導致聖人正學無人肄習；其次，由於單一部門崗位有限，士人專業化，在單一部門發展，金字塔形的上下級結構，無疑會極大限制官員的上升和流動。官員久任其職，也因之難以實施。

然而，隨著晚清中外交流和社會變遷，行政專業化畢竟是大勢所趨。這其中，最先提出專業化要求的，是外交領域。這首先是因為中外交涉，關係甚巨。交涉中的一個大意或無知，很可能令國家喪失利權；而中外間細小的爭端，則有可能演化為外交和軍事的巨大衝突。其次，對外交涉不能自說自話，沿用原有的思路，而須使用西方人熟悉的語言和規則，向對方爭取自己的利益。非久任其位，對西人制定的國際法則、條約制度有熟悉的瞭解，是無法勝任其職的。那麼，科舉制度下推崇通識、注重心性的士大夫，是否有可能轉換成專業性的外交官？如果有可能，他們又有著怎樣的成長經歷？

中國近代「專業性」的外交官，⁴來源有二：第一部分為我們所熟知，他們接受外國語言、政治學、法學等新式學科的教育，進入外交系統久任其職而成為職業外交官。他們或出自同文館系統，或留學英、美、日本等國，或擔任督撫幕僚，因語言、專業優勢或吏才而在外交界逐漸成長，活躍在清末民國的外交舞臺上，陸徵祥、顧維鈞、施肇基、錢恂等都屬此類。⁵另一部份，出自傳統科舉制度之下，他們有著顯赫的功名，因進入外交系統（總理衙門、外務部、駐外使館）長久任事而成為外交官。⁶在十九世紀末，前一類

⁴ 這裡藉晚清外交界自己的語言來解釋「專業性」外交官。1906年，駐法公使劉式訓提出〈變通出使事宜章程〉，指出，以往外交數十年的失誤，在於「未設外交專途」，認為使臣應「久於其任，有所展布」；外務部在議覆奏摺中稱言：外交為重要之圖，使才尤當務之急，非出入中外，無以資閱歷；非設立員缺，無以勵人才。應變通原有制度，使外交官「終身於外交一途，以儘其才。」可見，長久專注於「外交一途」，是新式外交官的最重要特點。外務部，〈議覆出使法國大臣劉奏請變通出使章程摺並清單〉，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收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大清新法令（點校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第2卷，頁256-261。

⁵ 這些外交官的成長及後來建立的事功，可參見其回憶錄、著作，重要者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1分冊；顏惠慶著，吳建雍、李寶臣、葉鳳美譯，《顏惠慶自傳——一位民國元老的歷史記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施肇基，《施肇基早年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羅光，《陸徵祥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⁶ 學界現有的研究，對清朝早期的一些駐外公使有較多的關注，這批人同樣生長於科

外交官出自「異途」，他們多未參加科舉考試，但後來卻成為民國初年外交界的主力；後一類出自科舉正途，因科舉制度廢除，並隨著自身年齡的增加和前者的崛起，慢慢淡出外交舞臺，因而也就漸為後人所忽視。事實上，在新舊過渡時期，後者既具備舊式功名和地位，掌握著更多的資源，又有著長期的外交歷練，因此也就更能在外交體制內享有話語權，並發揮實際作用。

關於早期外交官形成，學界有已有較多研究。王立誠曾將清末外交官分作三代，第一代為士大夫外交家，以曾紀澤為代表；第二代為從事西學之士的外交家，以伍廷芳為代表；第三代是完全職業化的外交官群體。⁷這種區分，是以出現的時間先後作為標準的，我則更傾向於以科舉制度作為劃分外交官的標杆。這是因為，科舉制度是當時社會的基本體制，傳統官僚制度中的成員，其身份、地位、思維方式、教育模式皆與之相關。科舉的興廢，不但於教育、社會及普通選官影響甚大，對於外交官的轉型，也有特別的作用。因此，本文也就格外注重科舉制度這一重要背景。儘管此前研究者曾對早期外交官的產生有所概論，但對於科舉制度之中外交官的產生這一問題，似尚無具體細緻的說明。⁸本文就擬通過汪大燮這一清末民初外交家的個案，對科舉制度之下專業性外交官的成長進行詳細說明。

汪大燮(1859-1929)，原名堯俞，字伯唐，浙江錢塘人。他以晚清舉人出身，發跡於總理衙門，一路在外務部、駐外公使職務上遷轉。中華民國成立後，曾任外交總長、平政院院長、代理國務總理、國務總理。在 1901 年力拒俄約、1917 年中國參加一戰、1919 年拒簽巴黎和約、1922 年收回青島等歷史事件中，發揮過實質性的作用。汪又殫心於教育、公益事業，歷

舉時代，因大員保舉而膺公使之職，其上任有較大偶然性，任期又多受制三年一屆的規定，且卸任後多轉入他途，因此，稱不上專業性外交官。

⁷ 王立誠，〈外交家的誕生：顧維鈞與近代中國外交官文化的變遷〉，收入金光耀主編，《顧維鈞與中國外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350-355。

⁸ 箱田惠子，《外交官の誕生——近代中国の對外態勢の变容と在外公館》（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社，2012），頁161-191；川島真著，田建國譯，《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107-127。箱田惠子在其上述論著第6章，探討了科舉制度下外交人才養成的問題，但我認為，她這裡提及的科舉，更多是時間標尺的功能，而並未論及科舉制度賦予士大夫外交官的諸多特點。

任清末留日學生監督、中華民國教育總長，晚年創辦北京平民大學。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在京組織治安維持會，保全民命與財產安全，汪職跨兩朝，兼有國內、海外的政治經歷。⁹

汪氏在民國屬於政壇老輩，但其建樹，主要在於外交界，他屬於清末民初最早一批外交官。晚清於 1861 年設立總理衙門，是其政治制度的一大變動，該機構經營洋務，主持外交、教育、工業、鐵路、礦務等各類新式事業，到庚子之後，改組為專業化的外務部，總理衙門原主管事務逐漸細分，由新設的商部、學部等中央各部繼承；總理衙門堂、司官員，演進為外務部專官。此時，在駐外人事上，駐外公使由大臣保舉模式，漸變為雜以外務部丞、參兼用的模式，外交官的養成逐漸專業化。科舉制度下選拔的一批外交人員，逐漸成長為具備從政經驗、國際視野、專業知識與國家意識的近代外交官。汪大燮的履歷，恰好涵括以上全部過程。他在清末民初的成長經歷，可看成那個時代變動秩序與制度轉型所留下的完整軌跡。

本文依賴的主體材料，是汪大燮寫給其族弟汪康年的二百通信函。這些信函始作於 1889 年前後，止於 1911 年汪康年病故前一月，跨越二十餘年，內容十分連貫，可作汪大燮本人的忠實自傳來看。本文試圖藉此重構汪氏的經歷，探究汪大燮這位出身科舉正途的士人，如何從效忠一朝一姓的士大夫逐漸轉變成抱持國家觀念的近代外交官的全過程，討論士大夫型外交官的成長與制度變革的互動，由此展示早期外交官成長的另一種模式。

二、早年的訓練與步入仕途

汪大燮早年的人生軌跡，與絕大部分傳統士人一樣，即讀聖賢書、參加科舉考試，以求踏入仕途，只不過多了一些新舊交替時代的獨特之處。

⁹ 迄今尚未見學界有關於汪大燮的研究。汪氏簡明資料，可參見王式通，〈故國務總理汪公墓誌銘〉；邵章，〈前國務總理伯唐汪公行狀〉，收入錢儀吉等纂輯，《清朝碑傳全集》（臺北：大化書局，1984）第4冊，頁3888-3890；徐凌霄、徐一士，〈外交家汪大燮遺事〉，《凌霄一士隨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第1冊，頁233-238。顧維鈞曾稱，汪大燮是對他以後的社會生活「關係很大」的二人之一（另一人是王寵惠）。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1分冊，頁47-48。

汪家出自錢塘振綺堂汪氏。振綺堂一系於明萬曆年間，由徽州黟縣遷居杭州，經營典當業，在家資充裕之後，收購善本，建造振綺堂藏書樓，一度成為頗負盛名的江左藏書及文學世家。清嘉慶以後，汪家因人口日增、用度日繁，當舖又遭遇劫掠，境況江河日下。在整個大家族中，多有人外出仕宦及遊幕。¹⁰汪大燮的曾祖汪阜與本生祖汪秉健(汪阜之侄)，皆出身舉人，分別在廣東任知州、候補知縣，生父汪清冕也跟隨父祖，在廣東做候補鹽經歷、鹽大使一類的小官。¹¹汪大燮生於 1859 年，幼年隨父母居住於廣東，少年時與族弟汪康年一起讀書。¹²

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歷經西潮持續衝擊，加之嘉道以來經世之學餘緒的影響，國內學術已有偏重實學的傾向。汪大燮生在廣東，接受當地教育，學術取向上首重實學，將傳統的八股時文看作「庸腐惡墨」。¹³1889 年，他與汪康年同返杭州參加鄉試，首場四書題，第二道名為「日月星辰繫焉」，汪康年別出心裁，用近代科學知識闡釋「繫」字：「以『繫』言天象，所以明重心」，他解釋說，日月星辰各有運行規則，是因為有「公重心」在。「以吸力解繫字，羅列最新天文家言，原原本本，如數家珍。」¹⁴汪大燮在考卷中則列舉了地日、地月的距離。¹⁵汪氏兄弟長時間在一起讀書作文，從二人考卷中可窺見汪大燮為學的取向。主考官李文田，原籍廣東順德，他對汪康年考卷最為賞識，認為「新舊學均有根底，非一時流輩所及」，本將其拔為解元，但因「第三藝作騷體，不合科場程式，乃改立第六。」¹⁶這一科，

¹⁰ 振綺堂汪氏概況，可參見徐雁平，《清代世家與文學傳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頁185-193。

¹¹ 顧廷龍主編，《清代朱卷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92）第281冊，頁209-212。

¹² 儘管汪大燮祖父、父親、外祖、舅父是浙江人，但都長期在廣東為官，汪最可能生於廣東。參見顧廷龍主編，《清代朱卷集成》第281冊，頁213-214。

¹³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十五年，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冊，頁620。這是汪大燮批評當年會試考卷的用語。

¹⁴ 顧廷龍主編，《清代朱卷集成》第278冊，頁203-206；汪詒年纂輯，《汪穰卿先生傳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35。「日月星辰繫焉」出自《中庸》：「今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朱熹集注，《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35。

¹⁵ 顧廷龍主編，《清代朱卷集成》第281冊，頁225-226。

¹⁶ 汪詒年纂輯，《汪穰卿先生傳記》，頁35。

二汪同時中式舉人。此後，他二人經世實學的為學取向更加明顯。

得到舉人功名後，汪大燮穿梭於京、浙、粵之間，為生計和前程奔波，汪康年則應邀入湖北張之洞幕府，他們之間開始了長達二十餘年的頻繁通信。汪康年赴鄂之後，汪大燮多次托其購寄書籍。他認為「古學，當世為之者多，且不切於用，不如通今為要。」他告知汪康年，自己的購書原則是「近人著述，不占占考古，而有實際者便好。」1891年，為準備次年會試，汪大燮托汪康年購買輿地學家鄒漢勳的論著，讓他關注漢勳之孫鄒代鈞編譯的新式輿圖，另托康年藉張之洞幕府的關係，購買海外出版的各類地圖。當時，王先謙的各種新著受到廣泛關注，然使汪大燮最感興趣的，是王的水經注研究。除輿地學之外，汪大燮也自學算術，曾托汪康年代購算學家梅文鼎的《輯要》，並自購《九章細草》、《算經十書》各書備查。此外，他還關注中外交涉之學，鼓勵汪康年將古今中外交涉事例編成一書。¹⁷

1892年，汪大燮34歲。他入京參加會試，但未能取中。為謀生計，他投入到早年鄉試主考李文田的幕中。李曾中探花，時任禮部侍郎，接順天學政之差，以精通元史、西北史地之學而聞名。由於有師生之誼，加之汪對經世學問頗為上心，因此李將自己所著各書原稿交付與汪，勉勵他接續自己的學問，努力從事西南地理之學。汪大燮頗受鼓舞，為李所著《元史地名考》編韻，並托汪康年代購善本俄國詳圖及洪鈞編譯的西北輿圖，以便深入鑽研元史。¹⁸

汪大燮熱心於經世之學，一方面因實學是其一向的治學興趣，另一方面也是出自實際層面的考慮：二汪鄉試成功的先例提示他，科舉時文加入新式實學的因素，或可使考卷增色。他曾將自己所編《元史地名編韻》抄寄汪詒年，供其作鄉試對策之用。也曾建議汪康年合理引導準備科考的外甥，「稍用實學功夫，門徑清楚，則將來方不為庸者掩也。」¹⁹

¹⁷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十七年五月初八日、七月二十四日、光緒十九年二月十七日、光緒十七年六月十九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626-627、634、652、630。

¹⁸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十八年十一月，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639-640。

¹⁹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十八年十一月、光緒十九年九月十六日，收入上海圖

汪大燮全力準備科考的同時，面臨的最大難題，是維持生計。在鄉試取中之前，汪就設法通過管道，尋找廣東的館事。他曾投在署連州知州沈宗濟處，襄辦帳房，兼做書記之事，為書院學生閱卷。²⁰這些工作對於學問長進幫助不大，未能合乎汪大燮心意。他也試圖回杭謀求館事，然未能如願。²¹於是，在 1892 年入京會試之後，汪大燮就一心留在北京做事。他進入李文田幕中，一是替李做些閱卷及語言翻譯的事(李為廣東籍，在與屬下蘇浙人士溝通時，語言頗為不便)，一面在李處兼習實學。不過，這只是權宜之計。

在科舉主導選官及社會群體流動、上升的時代裡，參加層層科考而獲得入仕資格，是讀書人最優的選擇，也是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最為可行的方式。振綺堂汪氏以詩書傳家，自 1861 年之後，直至 1889 年汪大燮、汪康年、汪鵬年同科中舉，科第上方有繼起者。²²汪家及汪大燮本人，對科考及入仕，也就格外看重。汪康年深知仕途對於汪大燮的重要，也瞭解他四處奔波，無法在舉業文章上深入用功的難處。1891 年 6 月，他寫信給汪大燮，建議其捐納京中的部院主事。²³

按照清朝制度，經由會試取中的進士，可分發六部任候補主事、內閣中書；舉人沒有分發六部任職的資格，但卻可走捐納的途徑。不過，與進士分部不同的是，舉人一旦捐納，就會由正途墮入異途，在補缺、升遷的道路上，受到名額、資格上的嚴格限制與排擠。大概考慮到這一層因素，加之次年會試在即，汪康年很快又改變了主意，勸汪大燮不必捐納。然在此時，汪大燮似已有意一試。他將自己的打算放在時局下考慮，說：「吾輩今日以科第為浮沉而已，然無論得第不得第，得官不得官，時局大事，已可概見。不過終其身，皆憂患之日已矣。」對於捐官一事，他的看法是「成

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640、664。

²⁰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十二年，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619。

²¹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十七年五月初八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606。

²² 汪詒年纂輯，《汪穰卿先生傳記》，頁35。

²³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十七年五月初八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626。

敗求其在己，毀譽聽之他人，期得吾心之安而已。」²⁴在會試中落第，進入李文田幕中的同時，汪大燮選擇捐納內閣中書，然不常入閣辦事。李因學政差使，在直隸各地視學，汪也隨之暫離京城。其中原因，主要是考慮到京城用度太大，外出則可避免酬應及一切閒費。²⁵

就在汪初入李幕、捐納內閣中書之時，汪妻王氏病故。數月後，當汪大燮回到京城，就有媒人紛紛上門說親。因收入微薄，在外生計艱難，汪在續弦之時，不得不將經濟實力納入考慮因素之內，而「相貌在所不究。」最終，汪選擇了刑部郎中沈家本之女，²⁶理由是沈氏為吳興大家，門風甚好；且沈家本任京官年久，即將外放天津府知府，空出的京中住房可供落腳，在經濟上也可稍微接濟汪家。汪認為，以他的現狀，「在京有甥館可居，無庸自立門戶為上」，「其次則每年有一定接濟，方能作長治久安之計。」²⁷1893年冬，汪大燮迎娶沈氏，經濟上稍顯舒緩，但卻遠做不到寬裕，他每天出門辦事，也只能與人合租馬車。²⁸

婚後的汪大燮，辭去李文田的館事，專心經營他的仕途。幾年京城生涯，讓他感覺到京中居、大不易，他希望外任地方府縣官員。具體計畫是，先參加1894年舉行的恩科會試，取中進士，將異途身份轉正；而後，利用為慈禧太后慶生大典出力的機會獲得勞績保獎，外任知府、同知。²⁹他也勸告已通過會試的汪康年，「當京官非吾輩力所能為，將來總擬出外」，勉勵

²⁴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十七年七月廿四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633。

²⁵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648。

²⁶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十八年十一月廿七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641。

²⁷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648-649。

²⁸ 汪大燮，〈致汪康年、汪詒年〉，約光緒十九年，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668。京官乘車外出，並非出於排場，而是因為北京缺乏近代的城市建設，塵土飛揚、臭氣熏蒸，雨天多泥濘，無法正常行走。參見劉光第，〈致劉舉臣函〉，光緒十四年八月，收入《劉光第集》編輯組編，《劉光第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196。

²⁹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十九年十月初七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669。

他在來年的殿試中爭取先進翰林院，接下來則以「老虎班」外任州縣實缺官。³⁰無奈事與願違，汪大燮在次年的會試中再次落第。

因中日甲午戰起，京中不寧，加之度日艱難，汪大燮頻繁往返於京津之間。按照制度，1895年還有一次會試，原本打算外出尋找機會的汪，再次滯留在京，等待來年的考試。不幸的是，他又一次會試落第。此時，外省公車及內閣同仁激切上書，試圖阻止簽署《馬關條約》，卻最終無濟於事。汪大燮對這一切看在眼中，他對朝中政治頗感意冷。國事紛擾，個人科舉與仕途諸多不順，汪忽然感覺出路和前程窄了許多。他出身舉人，以捐納方式成為內閣額外中書，周圍出身強過他的同仁，數不勝數。加之經濟壓力較大，促使他有了出京謀求館事的想法，他請求汪康年弟兄設法，幫忙在廣東、江蘇、湖北為他尋找游幕的機會。幾年間經濟的窘迫，甚至讓他認為，「依顯宦不如依富家，依富家不如依商賈」，他把在外地謀事當作首選。³¹

甲午戰爭之後，汪的同鄉王文韶接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汪料想北洋可能會有新的人事及政治局面，於是托汪康年及沈桂芬夫人輾轉為他說項謀差，然終因不滿王文韶幕中的筆墨工作及預測到可能出現的人事紛爭而最終作罷。³²至此，汪大燮又想到兩個出路較優、同時也最為可求的差事，這兩個差事，一是總理衙門章京，二是駐外使館隨員。

晚清時期待遇最優的差事，當時人總結為四種：「帝師、王佐、鬼使、神差。」詞臣奉旨授讀者，稱為帝師；六部司官、內閣中書任軍機章京、總理衙門章京，則稱為「王佐」，這是因為軍機處、總理衙門當時以親王領班；「鬼使」則指出使國外人員；「神差」指神機營差使，僅限滿人充任。

³⁰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十九年十月十一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671。清代翰林院庶吉士散館後得知縣者，稱為「老虎班」，在選缺時可優先，故得官最為迅速。庶吉士經散館考試，優者升編修、檢討，次者則改任六部主事、知縣。清貧者為得到外任實缺，往往故意在考試時出錯，甘居末等，歸部銓選知縣。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第1冊，頁302。

³¹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693。

³² 汪大燮，〈致汪康年、汪詒年〉，光緒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八月十九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706、709。

四者皆為差使，本身並無品級，但卻可使任差者的本職獲得較快的升遷。³³具體而言，擔任軍機處與總理衙門章京、駐外使館參贊、隨員者，其本職一般為六部主事、候補知縣一類的品級較低的職位。上述差使，雖無品級，但卻有定期的「異常勞績保獎」，可打破任差者的出身與資歷限制，幫助他們盡速補缺與升遷。在晚清，因捐納氾濫，加之會試錄取人數增加，候補官員積壓過度，上升路途擁擠，成為社會的一大奇觀。新科進士分部擔任候補主事，往往十數年、二十年也無法補上主事的實缺。³⁴汪大燮僅以舉人出身，又曾捐納內閣中書，故補缺升遷尤其困難，他謀求總理衙門章京及駐外隨員之差，掙取勞績保獎，可助他在仕進的路上，擺脫出身與資歷的限制，所以不失為理想的選擇。

按清制，駐外公使可自行奏調屬下參贊、領事、隨員、翻譯官，任期以三年為一屆，期滿回國，使團接受勞績保獎。³⁵1896年正是更換公使的大年。與此同時，清朝在甲午戰爭之後，有意分立原本由駐俄、駐英公使分別兼駐的德國和法國使館，謀取駐外差使的機會也一下多了起來。於是，汪大燮托王文韶替他向駐法公使候選人劉麒祥舉薦，任使館隨員，後因劉改變主意不願赴任而未果。³⁶不過，總理衙門定於1896年舉行章京考試，又稍增汪留京的動力。汪大燮自稱「驛(譯)署將考，去留難決，大約在今明歲間，非望富貴，但望飯碗長耳。」³⁷

³³ 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485。

³⁴ 例如劉光第在1883年考中進士，以主事簽分刑部，儘管他出身正途、辦事勤快，但因沒有勞績保獎，直到1898死前，仍為候補主事。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頁94。陳夔龍在1886年考中進士，分發兵部任學習主事，1896年時他說，自己「敘補名次第八，即每年出缺一次，亦須八年始能敘補。」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頁3。

³⁵ 按照光緒元年(1875)總理衙門所擬定的〈出使章程十二條清單〉規定：「出使各國大臣所帶參贊、領事、翻譯等員，應由該大臣酌定人數，開列姓名等項知照臣衙門查核，各該員亦隨同出使大臣以三年為期，年滿奏獎。如有堪留用者，應由接辦大臣酌留，倘不能得力，亦即隨時撤回。」見〈出使章程十二條清單〉，光緒二年九月十二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摺》，檔號03-9444-030。

³⁶ 汪大燮，〈致汪康年、汪詒年〉，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十九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709。

³⁷ 汪大燮，〈致汪康年、汪詒年〉，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

仕途上升的機會，讓汪大燮的南下之意遲緩了下來；在國事上的有所作為則更加堅定了他留京的意志。汪致力於經世學問，本也有意作濟世之用。作為浸潤於「修齊治平」教誨中的傳統士人，他一方面固然致力於科舉文章的長進及仕途的上升，另一方面也無時無刻不在憂心國家所面臨的緊蹙局面。甲午戰爭之後，京中士大夫多喜談論維新，汪冷靜地評論說：「京中言變法者甚多，自上上下下幾乎僉同，而大率皆不知世務之人，恐必糟無疑。」³⁸他對上層政治也有敏銳批評，稱軍機重臣翁同龢「無膽識」，李鴻藻「不欲認真舉辦，只圖空言敷衍」，他的同鄉王文韶主持北洋，「紆徐為研」。他讚賞張之洞在鄂的作為，感歎說：「即得五六香帥，天下猶可有為，何生才之不偶也！」³⁹1895年9月，京中士人擬成立強學會，以圖廣開風氣。由於強學會事業先從翻譯西方報刊、書籍辦起，因此也稱為強學書局。汪大燮與梁啟超被聘為學會的主筆。儘管汪在學會成立之初，即已看到主持者的矛盾，並預感事情難成，但他仍努力去做好分內之事。⁴⁰他向汪康年、汪詒年兄弟說，之所以勾留北京，重要原因之一，即強學會已起，他「樂觀厥成，亦庶幾日有所課以自效也。」⁴¹

強學書局開辦之後，致力於翻譯西文、日文報刊，刊刻新式書籍。汪大燮投身期間，推動翻譯事業。他曾為西人翻譯作筆述，又力圖促使強學會與汪康年所辦的「中國公會」合併，共同推進維新的開展。⁴²隨著事業逐步深入的進行，汪在京城的名氣漸長。1895年底，朝中重臣張蔭桓聘請汪大燮為家庭教師，汪順勢向張提出兩個條件，第一，請張主持強學書局即將開辦的新式學堂；第二，汪有意學習西文，請張聘一外文教習至張宅講

《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707-708。「譯署」為總理衙門的簡稱。

³⁸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十二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701。

³⁹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十九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710。張之洞號香濤，又任湖廣總督，因此被稱為「香帥」。

⁴⁰ 汪大燮，〈致汪康年、汪詒年〉，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十九日、三十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第710、712頁。

⁴¹ 汪大燮，〈致汪康年、汪詒年〉，光緒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716。

⁴² 汪大燮，〈致汪康年、汪詒年〉，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初八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717、718。

論。⁴³張蔭桓時任戶部侍郎、總理衙門大臣，是光緒帝信任的朝中實權官員，他對汪所提的要求給以滿意的答覆。1896年初，汪大燮正式進入張家，成為張蔭桓的家庭教師兼幕僚。

由於內部矛盾不斷，加之政敵的趁勢攻擊，強學會在開辦兩月之後，即遭到查封。汪大燮失去了強學會的事業，卻得以專心於張家的館事。汪在張宅教張蔭桓二子讀書，受到優遇。張專門延聘同文館教習，教汪外語；汪學外語也頗為勤奮，然受制於時間及年齡因素，進展不大。此時，汪大燮眼見清流之局逐漸破敗，他的友人、強學會重要成員文廷式遭彈劾撤職，他感覺「焦悶異常」。對於前途，他仍作兩手準備，第一，力爭考取當年的總理衙門章京；第二，出洋任差，藉機遊歷世界。出於對國內環境的擔憂，他將出洋謀事作為首選。⁴⁴於是，他再次托汪康年幫忙，在中國駐美或駐俄使團謀求隨員的差事，自認為「若出去三年，稍有盈餘，而洋文略有門徑，則以後或可吃飯，舍此竟無生路矣。」⁴⁵

1896年8至10月，總理衙門進行第八次章京招考。這一考試，由內閣與六部限額保送內閣中書、侍讀及六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參加，其中，漢員必須具備進士、舉人或拔貢出身。考中記名者，遇有總理衙門章京缺出，按照排名依次傳補。總理衙門章京是兼差，須在原部門及總理衙門兩處辦事，然以後者為主。這是因為，六部事務大致由書吏承擔，主事以上的司官，負責核稿、簽押；而總理衙門沒有書吏，須由章京直接理事。他們最主要的工作，是起草、收發總理衙門的各類文書，包括奏摺、信函、照會、簡文，將其交由總理衙門大臣簽押後發出，作為政府的正式文書執行。總理衙門不但主管當時的外交，也是新式鐵路、礦務、教育、稅務各類事業的總匯之地，因此，總理衙門章京事務繁多，領域極廣，是一項頗能歷練、培養外交及新式人才的職位。

⁴³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722。

⁴⁴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初二日、二十九日、三月初十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725、729、736。

⁴⁵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底三月初，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733。

總理衙門章京考試，一般從儒家經典中出一道論題，要求考試者圍繞文句進行自由論述。一般限定兩小時，數百字即可。主要考察應試者文理思路是否清晰、字跡是否工整。1896 年的考試，論題風格有大的變化，當年考題是「策問：中、俄、英、法陸路邊界設防險要。」⁴⁶考題以策問形式考察論者對中外關係、邊疆史地的看法，這恰是汪大燮歷來最為用心的地方。參加考試的人數共 195 人，最終滿漢共取 100 人。汪大燮在錄取記名的漢員中，排名第八。考慮到他的競爭對手多半是進士，汪的成績可以說是非常理想的。⁴⁷

依照規則，考取的章京須依次等待序補，其中時間長短不一。此時，汪大燮仍將出洋任差作為選項之一。他先應駐英公使人選黃遵憲之邀，與之同行，後因黃未能成行，此事只能作罷；不久汪又接到駐美公使伍廷芳的邀請。不巧的是，張蔭桓此時恰遭李鴻章排擠，差點出國接任駐俄公使。汪不忍棄故主而去，只能拒絕伍廷芳的盛情，改薦胞弟汪大鈞與伍同行。他本人則留了下來，一邊就館於張府，一邊等待總理衙門的傳補。他自我安慰說：「別路既無可走，株守譯署而已，家眷既來，日用不貲，亦只得得過且過，發財既不可得，即不必這山望見那山高矣。」⁴⁸

舉人出身的汪大燮，最終報考總理衙門章京，並獲得了記名。這一選擇，有出於生計、仕途的考慮；考中章京，則得益於他平日對邊疆史地、中外交涉之學的鑽研；未出國充當駐外隨員而留京等待任差，則純屬因緣際會。然而，就是這次的等待，徹底改變了他的職業、仕途與人生軌跡。

三、制度因革與外交官汪大燮的成長

總理衙門章京在傳補進署之後，有一整套循序漸進的訓練模式，即先

⁴⁶ 吳天任編，《何翹高先生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頁17。

⁴⁷ 在這次考試中，汪大燮的同鄉好友張元濟取中第一，唐文治第二，楊銳、錢能訓排名皆在20以後。考卷由張蔭桓、翁同龢共同批閱，參見李文杰，〈晚清總理衙門的章京考試——兼論科舉制度下外交官的選任〉，《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北京，2011.03），頁118-120。

⁴⁸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754。

入司務廳、清檔房，收發電報、往來文書，並編輯檔案目錄，藉以熟悉業務。而後進入署中的英國、法國、美國、俄國各股，從事稿件起草這一較為複雜的工作。這是一套重視業務與專業訓練的培養模式，與傳統六部倚重書吏辦事的舊制，完全不同。前文已述，六部司官出身科舉，他們接受儒學經義的訓練，目的在於倡導、發揚聖學，在四民社會中起引導作用。因此，多半不通具體部務，而只能將其交由書吏辦理。總理衙門為提高辦事效率，同時也為防止機密洩露，採用司官即章京親自辦事的模式，書吏只供抄寫文書之用。⁴⁹這種對軍機處制度的模仿，無意間促成總理衙門官員熟悉自身業務，使得總理衙門成為清朝少有的官員直接理事的職能部門。戊戌變法期間，有人曾向光緒帝呈遞條陳，請求裁撤各衙門書吏。條陳稱：

胥吏蠹國妨民，流弊滋甚。我朝諸儒指陳治道，前如顧炎武、黃宗羲，近如魯一同、馮桂芬，皆痛言其害至深。夫胥吏不能裁撤，由於例案過於紛紜。

又稱：軍機處、總理衙門規定章京辦稿，不假手胥吏，「立法最善」，因此建議飭下各部院仿照辦理。⁵⁰在這種制度之下，進入總理衙門的汪大燮和他的一批同事得以從高談形而上論、推崇「君子不器」的一般京官中脫穎而出，逐漸成為接觸具體外交事務、講求實效的職業外交人員。

事實上，汪大燮業務能力的培養，在入署之前就已經開始了。汪的東翁張蔭桓，籍貫廣東南海，是汪的半個老鄉。他通過捐納、保舉，由知縣、道臺一路升為京中卿貳，入值總理衙門。曾在 1885 年至 1889 年，出任駐美國公使。回國後，長期以戶部侍郎兼任總理衙門大臣，是總理衙門外部知識最多、視野開闊，也最能任事的實權官員，深得光緒帝信任。汪在張宅教讀，加之友人沈曾植時任總理衙門章京，因此有較多途徑和機會獲得政事要聞，他對此多加搜集、留意、思考，其眼光也比別人遠一些。例如，他較早得知李鴻章所簽《中俄密約》的大概內容，敏銳指出，其中雖規定中國遭受侵略時，俄國出面幫助，但「如何助法，亦無言也。」他諷刺挾俄

⁴⁹ 賈楨等修，《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北京：中華書局，1979）第8冊，頁2718。

⁵⁰ 謝希傳，〈前駐秘魯參贊指分直隸候補知縣謝希傳條陳〉，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摺》，檔號03-9453-047。

約為依靠的高官是「酣睡者」，「固以為既有泰山長城之倚，凡事皆可不辦矣」，預言他們將成為列強的代言人：「他人國中有黨，皆其本國之黨也，而中國將來亦有黨，則俄黨也，英黨也，法黨也，德與美之黨也。」⁵¹這些見識，遠過於當時寄希望於聯日或聯俄的高層官員。

張蔭桓是戶部侍郎，汪大燮也可能由此得知許多財政內幕。1897年，當他瞭解到，戶部短款數百萬，預測說：

其勢到極迫之際，必轉求赫德，赫德必有法想，息扣不必說，各口海關恐為他人之物矣。我國進項自己不明白，人家甚明白，指抵不足憑，必執持而據之也。⁵²

次年，清朝為應對財政危機，償還對日賠款，先自行發行國債「昭信股票」，效果極差；轉而接受赫德建議，向英國滙豐銀行、德國德華銀行借款1,600萬英鎊。所借債款，通過發行債券形式募集。對方極力壓低折扣，清朝最終只拿到實款的83.5%，同時提供4.5%的年利率。這些債款的本息，以海關洋稅及南方七口厘金作抵償還。汪大燮前一年的預測，全都不幸言中。⁵³

除了通過獲取外交與政經秘聞作沉潛思考之外，汪大燮在此期間受到的另一項重要訓練，就是辦理文稿。按照總理衙門制度，起草文稿，由總理衙門大臣責成章京去完成，但張蔭桓卻經常將這項工作交給尚未入署的汪大燮去做。1897年10月，貴州學政嚴修上奏，建議開設「經濟科」，由各地保送人才，參加新式經世學問的考試，以突破常規的方式收選拔人才之效。光緒帝命總理衙門與禮部共同議覆這項條陳。張蔭桓是此事的直接負責人，他授意汪大燮起草奏摺。⁵⁴時隔不久，汪大燮又受命，替總理衙門與禮部擬定「經濟科」的詳細章程。⁵⁵起草總理衙門奏摺，成為汪大燮真正

⁵¹ 汪大燮，〈致梁啟超、汪康年〉，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751。

⁵²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二十三年三月，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760-761。

⁵³ 王鐵崖主編，《中外舊約章彙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第1冊，頁733-737。

⁵⁴ 任青、馬忠文整理，《張蔭桓日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頁507-508。

⁵⁵ 汪大燮，〈致汪康年、汪詒年〉，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772、774。章程的起草

接觸外交事務的起點。除此之外，汪也常與張蔭桓討論時事，甚至論至午夜。張思想開明，辦事能力強，但自恃得光緒帝信任，難免傲慢，又忽視細節。汪大燮在其左右，時有規勸補助之語。⁵⁶

1898年8月後，汪大燮南下廣東。此行專為運送數年前病故的亡妻之靈柩回杭。⁵⁷以汪大燮之敏感，在戊戌變法開始之後，大約已感覺京中即將出現大波瀾。出京辦理私事，讓他躲開了一場政治風暴。11月17日，汪大燮回到京城。他所處的政治環境，發生了重大改變。首先，張蔭桓在政變中遭到嚴譴，發配新疆。其次，汪所待任的總理衙門，除張蔭桓被黜，另外兩位重臣翁同龢、李鴻章，也已在變法中先後退出；總理衙門章京張元濟、李岳瑞，因參與變法，被革職永不敘用，因此急需主持及辦事人才。汪剛回北京，就接到總理衙門的傳補通知，正式以章京身份進署辦事。按照制度，他先入司務廳，處理電報收發一事。此前汪還得到會典館詳校的差使，因此本職保升為內閣候補侍讀。⁵⁸兩年後，又改任戶部候補郎中。⁵⁹

由於跟隨張蔭桓已久，對總理衙門事務較為熟悉，加之平日留心時政，知識面寬，汪大燮在入署後，辦事熟練，事理通達，所擬各項稿件，詞能達意，恰如其分。入署僅兩月，即被總辦章京倚重，有意升為俄國股章京。⁶⁰他同時也得到總理衙門大臣許景澄、徐用儀的器重，常被委以草擬各股重要稿件的重任。汪大燮為人謹飭，不喜張揚，他一方面樂於任事，另一方

者還有總理衙門章京沈曾植。康有為自稱，經濟科的章程由他和沈曾植共同草擬，這是康的自我張揚之詞，張蔭桓日記與汪大燮書信不支持康的說法。參見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頁284-287。

⁵⁶ 張蔭桓戊戌年日記多處記載與汪大燮談話，日記7月22日條記載：「昨伯棠來飯，談至子初。」8月7日條記載：「午後伯棠來晤，以現草路礦疏稿示之，謂余將開罪於現辦鐵路之人，余亦不暇計也。」（任青、馬忠文整理，《張蔭桓日記》，頁546、549。）

⁵⁷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二十四，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774-775。

⁵⁸ 總理衙門，〈總理衙門片〉，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摺》，檔號03-5366-139。

⁵⁹ 清華大學圖書館、科技史暨古文獻研究所編，《清代縉紳錄集成》（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第68冊，頁243。

⁶⁰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二十五年四月初七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803-806。

面也意識到自己的舉動會遭同事之忌。不過，考慮到擬稿內容通常十分重要，他也顧不得別人的白眼。⁶¹這些，埋下數年之後汪與外務部同事紛爭的種子。

戊戌政變後，京中政治空氣肅殺。保守派抬頭，縱容義和團排外，釀成 1900 年的庚子事變。清朝與列強開戰，隨後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帶光緒帝西逃，汪大燮則與家人南下避難。10 月，得知中樞暫時在西安停留，汪與同鄉京官吳士鑒、夏敦復同赴陝西效命。

在聯軍侵華的同時，俄國另出動遠東軍力，藉口自衛，強佔東北三省。駐俄公使楊儒受命，與俄國談判交收東三省一事。俄方提出苛刻的條件，要求東三省、蒙古、新疆所有的鐵路、礦產利益為俄國佔有，東三省員警須由中俄會商數額，中國須隨時撤換不合俄國之意的官吏。這些條款引發國內督撫及英日等國極為不滿，楊儒奉命商改條約。然而，俄國對原稿僅作微調，即發出最後通牒，威脅楊儒半月內簽約，否則將長期霸佔東北。考慮到拒約可能出現的嚴重後果，西安行在電令楊自行定計，稱朝廷無法「遙斷」！當時，李鴻章傾向簽約，但張之洞、劉坤一等則強烈反對，楊儒未奉明確電令，不敢決斷。⁶²1901 年 3 月 24 日，在最後通牒到期前三天，汪大燮用總理衙門大臣桂春(此前曾獲駐俄公使任命)的名義起草一份奏摺，詳陳各國均勢利害，堅稱萬不能於各國和約之外，別訂專約，致啟各國效尤之漸。⁶³這份奏摺的意見隨即得到採納，清朝電令楊儒拒約，俄國也最終改與清朝重新議約。由此，汪在外交界的聲名為京內外所周知。他在中外交涉領域多年的留心與歷練，也終於在這裡派上了大的用場。

⁶¹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 1 冊，頁 752-755。

⁶² 交涉過程可參見楊紹震，〈庚子年中俄在東三省之衝突及其結束〉，收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第 15 編，頁 583-635。

⁶³ 許恪儒整理，《許寶衡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147。該摺的原文已無法找到，但軍機處《隨手登記檔》存有目錄，該檔冊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條記載：「戶部桂春摺，東省條約萬不可允謹陳利害由。」下記錄奏摺去向：「封存」。(「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初五日」條，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隨手登記檔》)桂春當時以戶部侍郎兼任總理衙門大臣。

1901 年，清朝依據辛丑和議的條款，將總理衙門改組為外務部，總理衙門原有的英國、俄國、法國、美國各股，被改設為和會、考工、樞算、庶務四司，外務部從總理衙門章京中間挑出 24 名得力之員，充任各司郎中、員外郎、主事，另設左右丞、左右參議，取代總辦章京，總司部務。之前有過良好表現的汪大燮，被任命為和會司員外郎，並兼任庶務司主稿之差；同時開去戶部候補郎中，以便專事外務部事務。從此，汪大燮的外交職業生涯，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前文已述，總理衙門採用章京直接理事、擯斥胥吏的辦事制度。總理衙門改組為外務部，章京轉變為司官，這一制度相應由外務部繼承。外務部也由此成為不同於傳統六部，改由官員辦事、擯斥胥吏的中央機構。

外務部因納入部院體系之中，其制度便與總理衙門有較大區別：總理衙門大臣、章京，皆屬於「差使」，本身並無品級。任差者的升遷，須藉助其本職來完成。晚清官場壅塞，中下層官員升遷極為困難。總理衙門章京這一差使，有定期的「異常勞績保獎」（兩年一屆），任差者可得到升階升銜，從而便利補缺和升遷。這對於中下層京官而言，是極好的晉升階梯，但對於外交人才的培養而言，卻非常不利。充任章京者，本職為內閣、六部、理藩院等機構司官，他們進入總署，多是希望憑藉兩年一次的異常勞績保獎，便利他們在總理衙門之外的本職升遷。故差使淪為本職的附庸，京官的注意力，在他們六部的本職，而非總理衙門的兼差。駐英公使薛福成在觀察中外制度差異后，曾檢討說：總理衙門章京「在署十年而稍習公事，無不得關道以去矣」，正是因為有了勞績保獎，所以能迅速升遷外放，然而對於外交領域而言，「如是而欲洋務人才之練習，其可得乎？」⁶⁴外務部改革，將章京改差為職，將其納入到與六部相同的體系之中。官員自帶品級，可在本部求得逐級的升遷，這就為他們長久任事於外交部門提供了制度的依託。汪大燮本職為戶部候補郎中，未實授；既授職外務部員外郎，職級從五品。貌似降級，但獲得了實缺；更重要的是，他的上升就此被納入到相對獨立的外務部系統之內。

1902 年，外務部總理大臣奕劻之子載振奉命赴英，參加英王愛德華七

⁶⁴ 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記》（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下冊，頁733。

世(Edward VII, 1841-1910)登基大典，外務部左丞瑞良向奕劻推薦汪大燮及樞算司主事唐文治二人隨行。⁶⁵汪早有外出遊歷意向，希望能深入瞭解西方各國政情，然此行過於匆忙，他對訪問效果並不滿意。⁶⁶1902年10月底，汪大燮回國不久，突然接到一道上諭：「外務部奏請派日本遊學生總監督一摺，四品銜外務部員外郎汪大燮著賞給五品卿銜，派充遊學日本學生總監督，所有遊學各生均著歸該員管轄。」⁶⁷

這一任命令人意外。論理，當時赴日的學生日漸增多，派人管理也在情理之中，清朝此前曾在美國及歐洲地區設立過此類差使。然在任命之前，汪並未接到協商；且汪只是普通外務部司官，並無教育管理的經驗。所以，他不願就任，希望辭去差使。這時，左參議顧肇新出面勸說汪，對他說，「汝毋辭，部中是沒有你的好處」，又解釋說，如汪留京，最好不過京察得優，而後外放知府，還不如離開本部，出洋任差更為划算。原來，汪的能幹，已遭來同僚的妒忌。

外務部制度，與傳統六部體制有一項重大差異。傳統六部司官中，最高位階是正五品郎中，其與最低階堂官正二品侍郎，存在巨大懸隔。各部司官因此不能直接升任堂官，須出京外放道府，或離開本部，藉京卿之位緩慢上升。外務部在成立時，為安置四名總辦章京，特別在各司郎中之上，設置丞與參議，位階分別是三、四品，這樣一來，司官可經主事(正六品)、員外郎(從五品)、郎中(正五品)、參議(正四品)、丞(正三品)直升至外務部侍郎(正二品)、尚書(從一品)。這一制度，便利了外務部官員的遷轉，也有利於外交人員的職業化。但是問題在於，丞、參議職位極其有限，且因外務部侍郎、尚書相對固定，丞參向上流動極慢，缺出機會很少。顧肇新的表侄、庶務司員外郎鄒嘉來，出身進士，早在1890年就已考取總理衙門章京，他對辦事能力較強、品級與他相當的汪大燮、沈曾植極為忌憚，認為是其上升丞參的最大阻礙，設法將其排擠出部。沈不久即外放江西廣信府知府，

⁶⁵ 唐文治，《茹經先生自訂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頁41-42。

⁶⁶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九日、七月二十八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818-819。

⁶⁷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第28冊，頁265。

汪大燮在知曉其中有所運作的情況下，汪一心赴日，去做留學生監督。⁶⁸

不想，這樣的任命，反倒成全了汪大燮的上升。1903年，外務部左、右丞先後升遷，其位置由左、右參議依序升補，從而空缺出正四品的左、右參議缺額。依照規則，該職務須由部中正五品官員升補，汪大燮品級恰當，且有駐外任職的經歷，因此反被推薦為最適當的人選。9月，他被委以外務部左參議之任。⁶⁹駐日學生監督之差，反而成了汪登進丞參的階梯。

從1903年10月回國任參議之職，到1905年7月接受新的使命，汪大燮在外務部歷練兩年之久，在公事上，他辦事低調，講求實效。日俄戰爭結束後，兩國約定在美國議和。外務部認為中國無法置身事外，對和談頗為在意。1905年7月，外務部派侍郎那桐赴美，參與日俄議和。汪大燮因表現良好，受堂官器重，被選派隨同赴美。該計畫隨後遭到日本的強力阻止，那桐未能成行。⁷⁰於是，外務部採取變通方式，讓駐美公使梁誠奏調汪大燮出任駐美使館參贊，搜集日俄議和的情報。⁷¹

總理衙門時期，總理衙門章京、大臣多出身科舉，而駐外公使自行奏調的參贊、隨員，則沒有身份限制，兩者在人事上相互孤立。為推動外交官職業化，外務部對此進行改革，其章程規定，部內主事、員外郎、郎中，可備駐外隨員、參贊之選；丞與參議，則可備駐外公使之選。⁷²為探聽日俄議和的虛實，汪大燮破例以正四品外務部參議任駐美參贊，由此成為級別最高的駐外參贊。

⁶⁸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廿九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830-836。

⁶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29冊，頁221。

⁷⁰ 那桐在1905年7月3日日記中記載：「外務部值日，兩宮在仁壽殿召見，垂詢日俄戰事甚詳。皇太后諭：爾近來辦事甚歷練，將來朝廷大事全仗你了。桐叩謝溫諭，刻餘退出。申刻訪內田公使，談美京派使事，酉刻歸。」北京市檔案館編，《那桐日記》（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上冊，頁540。鄒嘉來在次日日記中記載：「那堂召對，已定派赴美（並奏帶伯唐與會），預聞日俄和約，卻為日使內田所阻。」鄒嘉來，《儀若日記（稿本）》（日本東洋文庫圖書部藏），1905年7月4日條。

⁷¹ 梁誠，〈駐美大臣梁誠發外務部文〉，光緒三十一年六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檔案館藏，〈外交檔案〉，檔號02-12-050-01-034；外務部，〈外務部發美國公使柔克義照會〉，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外交檔案》，檔號02-08-001-02-071。

⁷² 〈外務部章程〉，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美關係史料（光緒朝）》（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第4冊，頁2954-2956。

就在汪大燮赴美之後不久，他接到一項更高的任命。9月20日，國內發來電旨：「外務部左參議汪大燮著充出使英國大臣。」⁷³這一任命，對汪大燮而言，是極大的挑戰，也是難得的機遇。

19世紀末期之前，英國是對清朝影響最大的國家，駐英公使一差，皆由位階較高的官員的擔任，他們一般是各省按察使或布政使，回國後可升巡撫或總理衙門大臣。⁷⁴甲午戰爭之後，清朝公使多用駐外參贊及語言人才，不再強調駐英公使的本職官階。這一差使，須做、可做的事情極多，然其當時面臨的最大困難，在於經費太少。按照制度，出使經費本是從海關的六成洋稅中撥出一成半，作為專款。⁷⁵晚清由於賠款、賑災、辦理新政，財政捉襟見肘，出使經費一次次遭到壓縮；與此同時，由於清朝使用與西方不同的銀本位，在世紀初銀價下跌之時，駐英使館經費的購買力，驟然縮減到原額的四分之一。每年總額為銀六萬兩的駐英公使經費，成員薪水用掉三萬，房租占一萬，剩下二萬兩，支付使館的日常用度和公使自己的工資。如果希望稍有作為，公使就須自掏腰包，每年賠上銀二三萬兩不等。為節約經費，汪大燮之前的公使龔照瑗、羅豐祿、張德彝極力減少用度：不乘馬車、不宴請使臣，使館內部亦不注重佈置、打掃，大失體面，在外影響極差。⁷⁶正因為如此，已被當作駐英公使人選的朱寶奎，猶豫逡巡，拒

⁷³ 〈諭旨〉，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電寄諭旨檔》，檔號1-01-12-031-0101。

⁷⁴ 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本職為「開缺福建按察使以侍郎候補」，兼任總理衙門大臣；第二任駐英公使曾紀澤為侯爵，回國後任兵部右侍郎、總理衙門大臣；第三任駐英公使劉瑞芬江西布政使，回國後升廣東巡撫；第四任駐英公使薛福成出國前為湖南布政使，在外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第五任駐英公使龔照瑗上任前任四川布政使。錢實甫編，《清代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0）第4冊，頁3028-3039。

⁷⁵ 將洋稅進行四、六分成，源於1860年〈北京條約〉，當時規定，海關洋稅各分二成，償付英法賠款。後賠款還清，四成洋稅作為解部專款，名目依舊；而六成洋稅，則被存留各關備用。1876年，總理衙門奏定，各海關將六成洋稅撥出一成，定期匯給江海關道，作為出使經費。1878年，總理衙門將此撥款比例增至一成半。參見陳文進，〈清季出使各國使領經費〉，《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北京，1933.05），頁281。

⁷⁶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828-829。

絕前往。⁷⁷

汪大燮在美國接到電旨之後，當即表示，希望入京覲見，大概亦是有所推辭。結果隔日接到電旨：「著即赴任，毋庸來京請訓。」⁷⁸他推測，此次任命，又是鄒嘉來等人動的手腳。此前，就在他接受駐美參贊後不久，外務部即上摺，讓鄒以考工司郎中身份署理左參議。⁷⁹對於駐英公使之差，汪到英之後分析說：「部中人亦無不知此席萬不可為，所以畀之鄙人者，使你一動動不得，一事辦不了，你從何處再得聲望，又從何處再討生活？」⁸⁰

10月19日，汪大燮由左參議遷為右丞，鄒嘉來順勢升任右參議，並署理右丞一職。按照外務部制度，丞與參議出差任駐外公使，毋庸開去原職，汪大燮雖身在英國，但保留本職。當左丞紹良改任內閣學士而退出外務部時，右丞陳名侃依序升補左丞，右丞原職則留給汪大燮補任。

在英期間，汪大燮一反前任公使足不出戶的保守做法，他經常外出參加各國公使交際活動，藉以瞭解各國外交動向，學習外交手段。有此前長期積累的外部知識與交涉經驗作為基礎，汪在英國，對各國外交活動的觀察和體悟更加深刻。他深感中國缺乏合格的外交官，力主進行制度改革，提出駐外公使須以精通外語為任職前提，建議外務部儲才館應儲備相關書報，研究法律及各國政治外交情事。⁸¹他還試圖收回威海衛租借地，並在禁煙、改用金本位、建設海軍方面多有建言。載澤等人赴英考察西洋憲政之時，汪大燮詳細為之引導，聯合使臣上奏建議立憲，宣佈地方自治，並定集會、言論、出版之律，獲得國內朝野人士大範圍認可。⁸²

⁷⁷ 〈朱觀察將簡英使〉，《申報》（上海），1905年9月14日，3版。

⁷⁸ 〈諭旨〉，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電寄諭旨檔》，檔號1-01-12-031-0106。

⁷⁹ 鄒嘉來，《儀若日記（稿本）》，1905年7月23日條。

⁸⁰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833。

⁸¹ 〈抄呈出使汪大臣函示儲才館應辦各事說帖〉，光緒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奉堂批，收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大清新法令（點校本）》第2卷，頁41-43。

⁸² 〈出使各國大臣奏請宣佈立憲摺〉，收入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4冊，頁24-27；「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初一日」條，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隨手登記檔》；錢儀吉等纂輯，《清朝碑傳全集》第4冊，頁3888。

1906年9月，清朝宣佈「預備立憲」，首先進行官制改革。傳統六部改革為新的十一部，外務部體制依舊，只是對主官進行了微調。外務部右侍郎唐紹儀改官郵傳部，正在駐英公使任上的汪大燮，被任命為外務部右侍郎。汪推測，之所以能在部門調整、人事紛爭糾纏不清的時候獲得侍郎之任，是因為慈禧太后看好他「不新不舊」的身份，可在新班底中起調停的作用。⁸³汪大燮出身舉人，歷官內閣中書、侍讀，並兼任總理衙門差使，這種身份使他極容易被傳統制度下的官員所接受；他長期任職於外交界，有出使經歷，思想趨新，在看到中國與西方外交官差距之後，極力主張制度改革，重視和主張培養新式外交人員，他甚至因自己不通外語而自請辭去公使。⁸⁴他的「不新不舊」，也可以說是「亦新亦舊」。正因為如此，汪成為各方都能接受的侍郎人選。

當然，從制度上而言，這一遷擢，與庚子之後外交制度的改革密不可分。正是由於外務部改章京差使為帶有品秩的正式職缺，並設置丞與參議的職位，使得汪大燮有可能長久留在外交界任事，逐級上升，並在駐外公使與部內職官之間互相轉任。否則，他很可能像薛福成所說的那樣，以外放海關道成為自己仕途的歸宿。

四、時代洪流與士大夫汪大燮的轉型

作為一名傳統士人，就思想而言，汪大燮是反對革命的。他服膺近代西學，希望學以致用，改變國家現狀，從今人視角看，屬於體制內求變的穩健改革者。

汪大燮一家三代在粵做官，親屬也在粵居住，他將廣東看成第二故鄉，對廣東一省的形勢與前景尤為關注。在1895年孫中山發動廣東起義失敗後不久，汪大燮在給汪康年信中稱：「粵中匪徒勢甚騷動，聞有電驛(譯)署請轉電各國捕孫文。茶陵護湘人，而掣鄭紹忠肘，鄭將死，死則全省動矣。」

⁸³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894-895。

⁸⁴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九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883-885。

茶陵，兩廣總督譚鍾麟，他是湖南茶陵人；鄭紹忠，廣東水師提督。譚鍾麟偏袒同鄉，限制鄭的行動，汪大燮由此表達對廣東局勢的憂心。不久，鄭紹忠病故，汪大燮判斷：「鄭心泉已死，即無孫文，廣東亦不久安也。」⁸⁵在他看來，孫中山是廣東的亂源之一。

汪大燮做事講求腳踏實地。面對自古未有的中外時局，他不問國家是否要變，而問如何去變。當外界樂於討論、評判變革的價值之時，他則埋頭苦思具體可行的改革舉措。他長時期致力於邊疆史地、算學、交涉、外語等學問，一是為應對科舉時文的變化，更重要的，也還是為解決當時所面臨的種種難題。正因為如此，當甲午戰後，京中風氣喜談變法而拿不出可行的方案之時，他冷靜評議變法派：「大率皆不知世務之人，恐必糟無疑。」⁸⁶

在 1896 年前後，汪大燮的政治立場與汪康年一樣，傾向於擁護張之洞。康有為私自操作上海《強學報》使用孔子紀年，並刊載上年光緒帝發下其條陳令督撫議奏的上諭，以此自矜，引起張之洞與康的分裂，汪大燮稱「(上海)強學會被康長素糟壞，致有浮言」，⁸⁷他對康有為藉該會推行一己之學的做法，深表不滿。兩年後，當他發現康有為在保國會演講，只說國家將亡，危亟之至，「而從無一言說到辦法」，他甚不以為然，認為康別有用心。他斷定康有為「不能默爾而息，然必無所成就。」

汪大燮對康有為一派的反感，一部分源於他實幹的作風。他看不慣康有為派的言語空洞、學說虛妄與作風不實。在京中政壇漩渦的親身經歷，對政治內幕的冷眼旁觀，使得汪大燮對康有為一派的所作所為有了深刻、透徹的體認，與康氏改革漸行漸遠，從而逐步清晰、認可並堅定藉西法穩健改革的政治取向。⁸⁸

擔任駐英公使期間，汪大燮一反前任無所作為的舊例，希望在改善國

⁸⁵ 汪大燮，〈致汪康年、汪詒年〉，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初十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736。

⁸⁶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十二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701。

⁸⁷ 汪大燮，〈致汪康年、汪詒年〉，光緒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723。

⁸⁸ 汪大燮，〈致汪詒年〉，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787。

家的外部形象、促成國家變革、保障國家安全上有所作為。與革命黨及康有為派(保皇派)不同的是，他的改革主張，是在現政權主導之下，採用切實可行的西式方法逐步展開。他在日本、英國期間，看到日本人竭力為其本國辦事，又聯繫到中國人對本國事漠不關心甚至竭力反對，大有感慨地說：「日本人讀外國書辦本國事，一片血誠，真可佩服。乃中國人讀外國書厭其本國至於如此，真可哭也。」⁸⁹他主張學習英國，實行君主立憲。

1905年，清朝派遣載澤、戴鴻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鐸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出洋時，汪大燮恰好接任駐英公使。為了讓考察充實有效，他與各大臣信件聯絡，商定日程，並特意聘請美國政治學教師，為各大臣分類講授英國中央官制、地方自治、員警、刑獄、市政、商會各種專題，同時安排相應的參觀。對於海軍、陸軍建設這兩項特殊且重要的領域，汪直接與英國政府聯繫，要求管部人員派人詳細講解其中細節。⁹⁰他極贊同五大臣之一載澤的立憲主張，即「立憲是綱中之綱，大綱不立，事事皆枝節，毫無益處。立憲既定，則當以財政及地方自治為要義，然後可以言其餘」。汪大燮由此托汪康年居中幫忙，在瞿鴻禨面前「極言」載澤「品端行粹，大可有為」，同時也勸載澤聯絡並運作載振，從而帶動奕劻出面幫忙。最後，自己再出面上奏，陳述立憲步驟與方式，從而多方增進立憲成功的機會。⁹¹

對於革命黨試圖運作群眾及海外華僑推翻現政權的做法，汪大燮極為擔憂。1905年，汪在路經夏威夷赴美時，遇同船的三合會會員，觀察對方「極粗鄙」。他評價革命黨活動時說：「此輩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一有擾亂，牽動外界，大局便不可問。」他認為，消弭革命的對策，在於當局「能知天下大勢所趨，辦一二大事，以結民心，動外人觀聽」，如果處理不好，恐不久就會出現明末「顯(獻)、闖之亂」。⁹²1906年，孫中山前往新加坡發行

⁸⁹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840。

⁹⁰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79)上冊，頁20。

⁹¹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837。

⁹²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862。

革命政府債券，募集反清革命的經費。⁹³汪大燮委派的駐新加坡領事官孫士鼎恰好剛剛到任。孫士鼎在保護華工、僑商事情上十分盡心。當年5月，孫照會新加坡總督，促使對方廢止長時期以來華工登岸須裸身接受檢疫的惡規，此事讓新加坡華人大受鼓舞。⁹⁴孫的種種做為，受到汪大燮的讚揚，被認為頗能散革命黨人之黨羽。

作為傳統的士大夫，汪大燮無法認同革命黨人動搖現有秩序，而行革命的主張，他有自己獨特的國家觀。這種國家觀，除來自文化傳統中的孝悌忠君之義，另一個重要源頭，就是汪在外所接受的近代國家觀念。這種觀念告訴他：

凡國家之見重於人，非國家自為之，必有人為之。此人何人？一為政府，一為國民。政府有能力而國民贊助之，雖弱必興。政府失其能力，則國望必減，而外交必受損。故國民必當効輔助於政府，而不可使政府失威信，即至更換政府之際，新政府一日未成立，舊政府之尊崇一日不能去。此為立憲之精神，今我希望立憲而乃反其道行之，烏乎可？⁹⁵

國家並非空洞的概念，而是由政府 and 國民組成，須由政府出面主持和代理，政府威信、政府能力關乎國際地位與國家利益；政府並非不可變更，然在未變之前，就仍須竭力尊崇。由此，也可見汪大燮對王朝、政府態度的悄然轉變，即從原有的儒家立場，轉變為夾雜較重立憲主張的近代思想。儘管兩者都主張維持清朝政權，但內涵卻大不相同。

1907年前後，江浙地區興起浙路風潮。事情源於1898年簽訂的《蘇杭鐵路草約》。此前在1897年，列強掀起瓜分中國鐵路、礦務利權之潮，鐵路大臣盛宣懷與英國怡和洋行、滙豐銀行簽訂草約，由英國公司承辦蘇州

⁹³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上冊，頁365-368。

⁹⁴ 〈代理新加坡領事申文一件〉，光緒三十二年五月，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關係檔案史料彙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第1冊，頁320。

⁹⁵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966。

至杭州鐵路，這一約定經英國駐華公使與總理衙門以照會形式確認。⁹⁶1905年，清朝在粵漢鐵路一事上的改約交涉成功，激發了浙籍京官與鄉紳廢除蘇杭鐵路草約的信心。⁹⁷他們要求外務部與英國交涉，收回蘇杭鐵路修築權，改為自辦。然此中最具難度的地方在於，粵漢鐵路合同，是中國與美國公司的簽約，屬商業行為；而蘇杭鐵路草約，則經由英國公使與總理衙門照會確認，其廢除或改定，皆屬政府行為。由於有這一層原因，英國公司與官方拒不廢約。

汪大燮早在駐英公使任內，就關注、分析國內的廢約主張，同時也尋求最優的解決之道。他對浙紳的廢約口號表示質疑，稱其「不問來由，而徒憤然曰廢約廢約，究竟廢之理由安在？廢之實力安在？國際事可粗心負氣行之耶？」⁹⁸他所贊成的方案，是借外國之款修築鐵路，將借款與修路分開。即通過英國銀行，以發行債券的方式來募集資金，供中國築路之用，債券由中國政府支付本息。他的主張，來自於多年在外積累的外部知識以及職業外交官的眼光。他不贊成強力廢約，其理由有二。首先，他認為，當初認可簽約，是政府行為，不可通過民意施壓來強行廢除；第二，「用外財辦內國事，各國皆有之，但患事權同去耳」，即借外債辦本國之事，國際上並不少見，只要做到借款時不附加政治條件、導致利權損失即可。若已爭回附著於借款上的利權，「究竟廢約之理由安在」，「其宗旨安在？」他批評，強行要求廢約的士紳，乃是「憑藉無根據之說，而與之隨波逐流。」⁹⁹

國內掀起浙路風潮之初，汪大燮尚在駐英公使任內，他擔心士紳的爭鬧，會對政府權威，進而對國家利益造成損失。中英交涉路權過程中，英國公使曾質問外務部尚書那桐：「一國只有一政府，故他國認其政府與之辦

⁹⁶ 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北京：中華書局，1963)中冊，頁433-435；王鐵崖主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1冊，頁843。

⁹⁷ 美國公司違背粵漢鐵路借款合同，讓比利時商人掌握鐵路多半股票，使得粵漢鐵路修築權易手，由此引起國人抗爭，最後以贖買形式，終結原有鐵路借款合同，改由中國自辦。

⁹⁸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初三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844。

⁹⁹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875。

事，今政府之言不足憑，是人人皆政府，以後我應向誰商辦事件？」汪大燮對此深有感慨：

國之所以並立於天地者，以政府而已。如以無政府國待之，是直以野番待之而已，哀哉！而我之自號為學人、才人、熱心人者，乃求為野番，哀哉！¹⁰⁰

在他看來，民眾挑戰政府，政府失去權威，即變成野番蠻國、無政府之國，徒啟外人用非文明方式對待中國之心。

由此，不難理解汪大燮對革命黨、保皇黨及浙江士紳等各派態度之由來。

作為一名王朝治下的士大夫、一名新興的外交官，除傳統及西方國家觀念之外，促成汪對革命黨、保皇黨不信任的因素，還有他自己一貫求實求是的作風。面對風起雲湧的浙路風潮，汪大燮並未因主張廢約的士紳皆為其同鄉，甚至包括多年好友乃至一度有族弟汪康年，就站在對方一邊，他不提抽象的民族大義，他所質問的，全都是實際、具體的問題。在私底下，出於其實幹的作風，他不僅對發動風潮的士紳、對革命黨，也對清政府進行強烈批評：

所謂志士，所謂國民，與政府同一病根。事前毫不預備，事後毫無佈置。事前預備，臨事可免倉皇。事後佈置，則此事失敗，他事可有殷鑒，此際失敗，將來尚可補救，不然其何能淑也？

他認為各方做法，皆對國事不負責任：

嗟嗟！國民志士則臨事一闕，政府則臨事一急，報館則臨事一罵，天下有如此可以謝天下卸責任者乎？天下有如此行事而可有希望者乎！難矣哉，難矣哉！¹⁰¹

汪大燮不贊成此時鐵路風潮及革命活動的另一原因，還有歷史與現實的經驗。1907年底，他得到消息說，革命黨人的鎮南關起義，有法國縱容的因素，故擔心「法人蠢蠢，不知如何做去。」當時日本也因中韓界務之事而有派兵之舉；與英國交涉廢除蘇杭鐵路草約，前途未卜，汪預測，可

¹⁰⁰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964。

¹⁰¹ 汪大燮，〈致汪詒年〉，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初四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851。

能「又將萬弩齊開，與光緒二十二、三、四等年情形相同。」¹⁰²他擔心，中國之亂，會授外人武裝干涉、攫取利權以充分的把柄。

他還從委內瑞拉與美國關係史中看到政府不穩、國權受損的殷鑒：

從前委內瑞拉不滿意政府，數月一易政府，與美國所商之事，總不能定。美國以兵臨之，其總統無法，只得逃走。國民倉皇，只得權推兵部大臣為總統，否則並無人可以接待美人也。兵部大臣以有兵權在手逃不了，不得不為總統。於是一切任美要求允之而去，吃虧萬倍。¹⁰³

據他觀察，此等國家，國民不知誰為國民，政府亦無真正政府，「無機體之國家，其效如此。」他當然不希望中國變成此等「無機體之國家」。

面對比江浙士紳更為激烈地挑戰現存秩序的革命黨人，汪大燮首先提出的疑問是，現政權問題很多，但是，若無政府國家怎麼辦？在舊政府被推翻、新秩序未建立之前，國家又該怎麼辦？他批評革命派及部分主張推翻政府的士紳：

約而言之，不過欲排倒滿洲政府而已。究竟是否可排，及排倒後如何狀況，不暇計也；並於既排未倒之際如何狀況，亦不暇計也。此至可危。

他請汪康年的報館宣導一種與潮流不同的主張，「俾亂萌稍遏，國事庶幾有彳。」又論述政府、國民、國家三者的關係，說：

要知今即合天下之人而反對政府，亦是自戕之道。其所以抵擋外界者，既毫無準備，則戕政府即自戕而已。報中插畫作種種惡劇以醜詆政府，政府諸人不足惜，要之政府非他人，我國民公共之政府也。

¹⁰⁴

1907年9月，從駐英公使職位上卸任不久的汪大燮被派往英國考察憲

¹⁰²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966。

¹⁰³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971。

¹⁰⁴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966-967。

政，為立憲作準備。汪抵英後，詳細考察英國國會、憲法、財政、國家機構、選舉制度、司法體系，編纂《英國憲政叢書》14種，將英國歷史上關乎憲政的史實分類條列，加以詳細考證和解釋。這是清朝歷次出使大臣對外國制度所作最深入、最詳細報告。汪大燮希望，英國的立憲政體能成為清朝學習的榜樣。他理想中的中國，是一個吸取立憲國經驗，以「舊邦發明新政」的國家。

1910年，汪大燮轉任駐日公使。這正是一直以來，他提醒當局日夜加以防範的國家。他上任後，多方搜集情報，匯總報告給國內。眼見日本步步緊逼，而當局卻對併吞的威脅缺乏認識，汪倍感憂心。1911年5月，汪大燮由日本回國述職。路經上海之時，汪特意召集昔日總理衙門的同事唐文治、張元濟密議局勢。針對日本威脅在側，國勢岌岌之勢，他們合議出救國之策：由醇親王載灃奉宣統帝赴英美求學，請奕劻主持國政，多招賢士大夫為之輔佐，速行改革。唐文治、張元濟共推汪赴京面奏條陳。據唐文治日後的記錄稱：

乃伯唐抵京後，醇邸僅召見一次，伯唐痛切敷陳。醇邸曰：「現有海陸軍，何有外侮？」伯唐曰：「中國海陸軍其可恃乎？」醇邸遽曰：「汝去！」伯唐出語同朝，皆莫之信，甚有以為無病之呻吟者。伯唐廢然赴日本，乃知國事萬不可為矣。¹⁰⁵

汪見過監國載灃之後，有友人前往謁見，探問日本對華外交方針究竟如何？汪回國究竟要陳述何項要政？據當時《申報》的報導，汪大燮對此「垂首不語者久之」，又說：「此後外交勢必日形棘手，若貪圖祿位，敷衍辦事，必誤大局。一俟諸事商妥，擬即請假回籍，不再出山云。」¹⁰⁶

汪本主張在體制內求變，振興財政、整頓武備，並推動清朝切實施行憲政，對外抗禦強敵，對內消弭革命，到此時，可謂心灰意冷。唐文治描述的「廢然」、《申報》所說的「垂首不語者久之」，傳神地描摹出汪大燮心中的失落與痛苦。

然汪氏畢竟是一個極負責任感的士大夫，有一種面對逆境時，知其不

¹⁰⁵ 唐文治，《茹經先生自訂年譜》，頁65。

¹⁰⁶ 〈汪使今日始嚇醒耶，然恐噬臍無及矣〉，《申報》（上海），1911年5月2日，3版。

可爲而爲之的性格。1895年，逢汪氏家族多事之秋，汪大燮勉勵汪康年說：「一家之興亡，亦有數在，但人事不能不盡耳。」¹⁰⁷他對家事如此，對國事同樣如此。他無法阻止國事陵替，王朝衰微，但他可以堅守崗位。對於一個深刻認同憲政思想的外交官而言，眼見政府沉疴日重，仍以駐外代表身份維持政府運作與國際承認，也正符合他所說「新政府一日未成立，舊政府之尊崇一日不能去」的所謂「立憲之精神」。

此後不到半年，武昌起義爆發，各省紛紛宣佈獨立，11月，汪大燮再上急電，以國勢危迫，請速開國民議會，已冀挽救。¹⁰⁸與此同時，汪大燮並未忘記，此時國家的重大威脅，仍是外患；駐外代表的職責，仍是維護國家安全。在武昌起義發生之後直到1911年底，汪大燮不斷將日方動向彙報給外務部，供國內研究應對。

然而，汪的同籍紳士，卻無法理解他的所作所爲。12月，浙江士紳召開第五次臨時議會，稱「汪大燮輩，其田廬墳墓皆在浙江，乃竟安然爲滿清之官吏，毫不動心，是亦失其人格，有玷浙江」，士紳們「先行電致上海，聲明浙人並不承認章宗祥爲代表，一面再籌對付汪大燮輩之方法。」¹⁰⁹打著民族革命旗號的浙江士紳，將汪擔任滿人朝廷官僚的做法視作背叛祖宗的舉動；然在汪氏個人而言，在其位謀其政；在駐外代表之任，「例當遵守外務部命令」，用職業外交官眼光來看，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¹¹⁰

政府代表國家，外交官秉承政府之命，維護國家利益，與是否「滿清官吏」無關，這是汪氏的國家觀。如果說，汪大燮最初反對革命，多半出於士人孝悌忠君之意，故無法容忍犯上作亂；那麼隨著外交官生涯的展開，外部知識的增加，他反對革命，極力維持政府，就越來越多是出於對憲政思想的認同以及職業外交官的自覺。外交官職司在維護國家利益，而政府

¹⁰⁷ 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緒二十年，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699。

¹⁰⁸ 〈汪大燮電〉，《申報》（上海），1911年11月15日，3版。

¹⁰⁹ 〈浙省第五次臨時議會記〉，《申報》（上海），1911年12月22日，10版。章宗祥當時隨唐紹儀，參與南北議和。

¹¹⁰ 汪大燮，〈致汪詒年〉，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初四日，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850。

代表國家，政府動盪影響國際承認，因此，外交官的汪大燮，有對現政府極力維持的努力。在這裡，國家利益至上的觀念，虛化了忠君事主的觀念，成為支撐汪大燮維護現政權的動因。也正因為如此，在王朝更迭之後，當汪大燮十分器重和欣賞的好友沈曾植、當他在總理衙門的諸多同事抱持大義，去做遜清遺老之時，他自己卻仍然堅守外交代表的崗位，等待新政府任用新人之後，淡出他認為已無可作為的政界。

五、結語

傳統科舉制度造就的士子，致力於埋首攻讀儒學經典，練習時文小楷，希望承續聖學，讀書做官，為天下師，不推崇做偏攻一隅、抱持吏事長才的治事專家。自十九世紀中期以降，西力東漸，與炮艦相伴隨的，是西式的國際秩序與交往規則。清朝統治者由此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派遣駐外公使，逐漸開始用西人熟悉的方式與他們打交道。從後面結果來看，這一時期辦理外交的官員，不能說才孚眾望，但是，到中華民國初期，新型外交官已蔚為大觀。這其中實際有兩部份人，一批是接受新式教育，在新式學堂或國外學習外語、法律、國際關係的新式人才，這一部份為我們所熟知，然還有一部份，此前為我們忽所視，他們直接源自科舉制度，由傳統士大夫轉型而來。汪大燮是其中較為典型的一個。他在晚清變動制度中的上升以及他國家思想的變遷，與前一類型外交官完全不同，代表著另一種路徑。

這一批外交官員早期通過科舉正途獲得入仕資格，成為體制內的內閣或六部京官，因任差於總理衙門而接觸外交。他們的成長與制度因革存在密切互動，這其中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總理衙門出於保密及效率的考慮，仿照軍機處制度，擯斥胥吏，通過司官直接辦事，避免了六部中胥吏把持政務的弊病，在無意間促成總理衙門章京直接辦理部務，使他們有可能成為外交專才，這種制度後來也被外務部襲用。另一方面，外務部改章京差使為實職，各帶品秩，又設立丞參制度，銜接堂司官員，改變總理衙門章京上升須藉助本職，堂司官員品秩懸殊、無法直升的弊端，使得

外交官員有可能在制度框架內久於其任，成為一方專才。

汪大燮見證和經歷了上述全部過程，許多和他同時代的總理衙門官員，都有著部份類似的經歷，例如沈曾植、張元濟、唐文治、鄒嘉來、呂海寰等等。相比同文館出身的外交官胡惟德、陳貽范，以及後來科班出身的外交官顏惠慶、顧維鈞，他們的特點非常鮮明。從時間上看，他們的出現遠早於後來的科班外交官。科舉正途出身，讓他們有著語言學生無法擁有的地位和聲望，因此在晚清外交事務中有著更重要的發言權。他們的知識源自於實際交涉，或經刻苦自學而得來，他們更容易在實踐中覺察到自己與西方外交官的差距，也更樂於推動外交改革，並著力於培養新式的外交人才。

科舉制度下傳統儒學的浸潤，修、齊、治、平的教誨，使出身士大夫的外交官有著家國天下的關懷，也讓他們的思想在變革時期更具複雜性。在思想的變化上，汪大燮比他的同事們走得更遠。起先，孝悌忠君的大義，讓他無法認同革命黨。隨著外交經歷的豐富，外部知識的增加，汪大燮的國家觀念逐漸加入憲政思想及現代國家理念，他理解中的國家，並非抽象意義，而是由政府與國民組成。政府非他人的政府，乃國民的政府。政府衰弱，缺乏權威，不能用律法約束國民，則說明國家野蠻，從歷史上看，只能授外人以干涉之柄。身為外交官，理應遵從外務部訓令辦事，對外爭取國家利益，代表政府，維護政府權威。汪始終站在革命的對立面，然據以立論的依據，卻由儒家理念，進而為憲政思想，從士大夫的視角，進而轉變為近代外交官的理解。

兩種觀念賴以立論的依據既已變化，改朝換代也被賦予不同的含義。對於忠於一朝一姓的士大夫而言，他所效忠的君主王朝難以割捨。對於服務於國家利益的外交官而言，他效忠的是代表國家的政府，他只須遵外交部訓令，問國家利益完整與否，王朝嬗替，於他而言，並非無法接受。1911年5月，汪大燮鄭重建議宣統帝外出留學，任用奕劻當國，廣招人才，尋求變革，這是他為挽救清室做的最後嘗試。這裡，他似已完成一名士大夫的最後使命，而由忠於一朝一姓的士大夫，慢慢轉身成為效忠國家、服務於國家利益的近代外交官。

在這一點上，僅少數士大夫型外交官有著與汪大燮相似的經歷，多數

人則並非如此。¹¹¹例如曾任駐德公使、外務部尚書的呂海寰，曾任外務部尚書的鄒嘉來，儘管也長期任職於外交界，熟知外事，但他們仍抱持對原王朝的認同。清亡後，主動或被動退出外交界，成為遜清的遺老。¹¹²他們都停留在士大夫的身份上，成為近代中國較為獨特的「士大夫-外交官」群體，而並未完成徹底的轉型。

¹¹¹ 與汪大燮經歷相似的，這裡僅舉陳懋鼎為例。陳為光緒十六年(1890)進士，考取總理衙門章京，歷任外務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左參議，駐英使館參贊，中華民國外交部參事兼秘書長、外交部山東交涉員、廈門交涉員、外交部顧問等職。

¹¹² 呂海寰經歷可見李文杰整理，〈呂海寰資料兩種〉，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史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第123期，頁118-163。鄒嘉來經歷見錢儀吉等纂輯，《清朝碑傳全集》第5冊，頁3999-4000。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檔案

〈出使章程十二條清單〉，光緒二年九月十二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摺》，檔號03-9444-030。

“Chu shi zhang cheng shi er tiao qing dan,” Guang xu er nian jiu yue shi er ri, Zhong guo di yi li shi dang an guan cang, *Jun ji chu lu fu zou zhe*, dang hao 03-9444-030.

〈諭旨〉，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電寄諭旨檔》，檔號1-01-12-031-0101。

“Yu zhi,” Guang xu san shi yi nian ba yue er shi er ri, Zhong guo di yi li shi dang an guan cang, *Jun ji chu Dian ji yu zhi dang*, dang hao 1-01-12-031-0101.

〈諭旨〉，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電寄諭旨檔》，檔號1-01-12-031-0106。

“Yu zhi,” Guang xu san shi yi nian ba yue er shi si ri, Zhong guo di yi li shi dang an guan cang, *Jun ji chu Dian ji yu zhi dang*, dang hao 1-01-12-031-010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隨手登記檔》。

Zhong guo di yi li shi dang an guan cang, *Jun ji chu Sui shou deng ji dang*.

外務部，〈外務部發美國公使柔克義照會〉，光緒三十一年六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檔案館藏，《外交檔案》，檔號02-08-001-02-071。

Wai wu bu, “Wai wu bu fa mei guo gong shi Roukeyi zhao hui,” Guang xu san shi yi nian liu yue,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shi suo dang an guan cang, *Wai jiao dang an*, dang hao 02-08-001-02-071.

梁誠，〈駐美大臣梁誠發外務部文〉，光緒三十一年六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檔案館藏，《外交檔案》，檔號02-12-050-01-034。

Liang, Cheng, “Zhu mei da chen Liang Cheng fa wai wu bu wen,” Guang xu san shi yi nian liu yue,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shi suo dang an guan cang, *Wai jiao dang an*, dang hao 02-12-050-01-034.

總理衙門，〈總理衙門片〉，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摺》，檔號03-5366-139。

Zong li ya men, “Zong li ya men pian,” *Guang xu er shi si nian shi yue, Zhong guo di yi li shi dang an guan cang, Jun ji chu lu fu zou zhe*, dang hao 03-5366-139.
謝希傳，〈前駐秘魯參贊指分直隸候補知縣謝希傳條陳〉，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摺》，檔號03-9453-047。
Xie, Xifu, “Qian zhu bi lu can zan zhi fen zhi li hou bu zhi xian Xie Xifu tiao chen,” *Guang xu er shi si nian ba yue chu san ri, Zhong guo di yi li shi dang an guan cang, Jun ji chu lu fu zou zhe*, dang hao 03-9453-047.

(二)一般史料、報刊

- 〈朱觀察將簡英使〉，《申報》(上海)，1905年9月14日，3版。
“Zhu guan cha jiang jian ying shi,” *Shen bao* (Shanghai), 1905.09.14, 3 ban.
〈汪大燮電〉，《申報》(上海)，1911年11月15日，3版。
“Wang Daxie dian.” *Shen bao* (Shanghai), 1911.11.15, 3 ban.
〈汪使今日始嚇醒耶，然恐噬臍無及矣〉，《申報》(上海)，1911年5月2日，3版。
“Wang shi jin ri shi xia xing ye, ran kong shi qi wu ji yi,” *Shen bao* (Shanghai), 1911.05.02, 3 ban.
〈浙省第五次臨時議會記〉，《申報》(上海)，1911年12月22日，10版。
“Zhe sheng di wu ci lin shi yi hui ji,” *Shen bao* (Shanghai), 1911.12.22, 10 ban.
《劉光第集》編輯組編，《劉光第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Liu guang di ji bian ji zu, bian. *Liu Guangdi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6.
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大清新法令(點校本)》第2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Shanghai shang wu yin shu guan bian yi suo, bian. *Da qing xin fa ling (dian jiao ben)*, di 2 juan, Beijing: Shang wu yin shu guan, 2011.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Shanghai tu shu guan, bian. *Wangkangnian shi you shu zha*, di 1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198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美關係史料(光緒朝)》第4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bian. *Zhong mei guan xi shi liao (guang xu chao)*, di 4 ce,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1989.
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第4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Zhong guo shi xue hui, bian. *Xin hai ge ming*, di 4 ce, Shanghai: Shanghai ren min chu ban she, 2000.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史資料》第123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bian. *Jin dai shi zi liao*, di 123 qi, Beijing: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chu ban she, 2011.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1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

Zhong guo she hui ke xue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yi. *Gu Weijun hui yi lu*, di 1 fen ce,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28、29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Zhong guo di yi li shi dang an guan, bian. *Guang xu xuan tong liang chao shang yu dang*, di 28, 29 ce, Guilin: Guangxi shi fan da xue chu ban she, 199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關係檔案史料彙編》第1冊，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

Zhong guo di yi li shi dang an guan, bian. *Qing dai zhong guo yu dong nan ya ge guo guan xi dang an shi liao hui bian*, di 1 ce, Beijing: Guo ji wen hua chu ban gong si, 1998.

王雲五主持，《道咸同光四朝奏議》第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Wang, Yunwu, zhu chi. *Dao xian tong guang si chao zou yi*, di 8 ce, Taipei: Tai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70.

王鐵崖主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1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7。

Wang, Tiejai, zhu bian. *Zhong wai jiu yue zhang hui bian*, di 1 ce, Beijing: Sheng huo, du shu, xin zhi san lian shu dian, 1957.

北京市檔案館編，《那桐日記》上冊，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

Beijing shi dang an guan, bian. *Na Tong ri ji*, shang ce, Beijing: Xin hua chu ban she, 2006.

任青、馬忠文整理，《張蔭桓日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Ren, Qing, Ma Zhongwen, zheng li. *Zhang Yinhuan ri ji*, Shanghai: Shanghai shu dian chu ban she, 2004.

朱熹集注，《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Zhu, Xi, ji zhu. *Si shu zhang ju ji zhu*,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3.

吳天任編，《何翹高先生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

Wu, Tianren, bian. *He Huigao xian sheng nian pu*, Taipei: Wen hai chu ban she, 1972.

汪詒年纂輯，《汪穰卿先生傳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

- Wang, Yinian, zuan ji. *Wang Rangqing xian sheng zhuan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2007.
- 宓汝成編，《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63。
- Mi, Rucheng, bian. *Zhong guo jin dai tie lu shi zi liao (1863-1911)*, shang ce,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63.
-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
- Gu gong bo wu yuan ming qing dang an bu, bian. *Qing mo chou bei li xian dang an shi liao*, shang ce,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79.
- 施肇基，《施肇基早年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
- Shi, Zhaoji. *Shi Zhaoji zao nian hui yi lu*, Taipei: Zhuan ji wen xue chu ban she, 1985.
- 唐文治，《茹經先生自訂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
- Tang, Wen zhi. *Ru jing xian sheng zi ding nian pu*, Taipei: Wen hai chu ban she, 1986.
-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第1冊，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 Xu, Lingxiao, Xu Yishi, *Ling xiao yi shi sui bi*, di 1 ce, Taiyuan: Shanxi gu ji chu ban she, 1997.
- 清華大學圖書館、科技史暨古文獻研究所編，《清代縉紳錄集成》第68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 Qing hua da xue tu shu guan, Ke ji shi ji gu wen xian yan jiu suo, bian. *Qing dai jin shen lu ji cheng*, di 68 ce, Zhengzhou: Da xiang chu ban she, 2008.
- 許恪儒整理，《許寶衡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0。
- Xu, Keru, zheng li. *Xu Baoheng ri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2010.
- 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
- Chen, Kangqi. *Lang qian ji wen er b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4.
-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
- Chen, Xiqi, zhu bian. *Sun Zhongshan nian pu chang bian*, shang ce,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91.
- 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
- Chen, Kuilong. *Meng jiao ting za ji*, Beijing: Beijing gu ji chu ban she, 1985.
- 賈楨等修，《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
- Gu zhen, deng xiu. *Chou ban yi wu shi mo (xian feng chao)*, di 8 ce,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79.
- 鄒嘉來，《儀若日記(稿本)》，日本東洋文庫圖書部藏。
- Zou, Jialai. *Yi ruo ri ji (gao ben)*, Ri ben dong yang wen ku tu shu bu, cang.

蔡少卿整理，《薛福成日記》下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Cai, Shaoqing, zheng li. *Xue Fucheng ri ji, xia ce*, Chang chun: Jilin wen shi chu ban she, 2004.

錢儀吉等纂輯，《清朝碑傳全集》第4、5冊，臺北：大化書局，1984。

Qian, Yiji, deng zuan ji. *Qing chao bei zhuan quan ji, di 4, 5 ce*, Taipei, Da hua shu ju, 1984.

錫珍等撰，《欽定吏部銓選則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75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Xi, Zhen, deng zhuan. *Qin ding li bu quan xuan ze li, shou ru, Xu xiu si ku quan shu, di 750 c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1995.

顏惠慶著，吳建雍、李寶臣、葉鳳美譯，《顏惠慶自傳——一位民國元老的歷史記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Yan, Huiqing, zhu, Wu Jianyong, Li Baochen, Ye Fengmei, yi. *Yan Huiqing zi zhuan: yi wei min guo yuan lao de li shi ji yi*, Beijing: Shang wu yin shu guan, 2003.

顧廷龍主編，《清代朱卷集成》第278、281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92。

Gu, Tinglong, zhu bian. *Qing dai zhu juan ji cheng, di 278, 281 ce*, Taipei: Cheng wen chu ban she, 1992.

(三) 專書

川島真著，田建國譯，《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Kawashima, Shin, zhu, Tian Jianguo, yi. *Zhong guo jin dai wai jiao de xing cheng*, Beijing: Beijing da xue chu ban she, 2012.

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Mao, Haijian. *Cong jia wu dao wu xu: Kangyouwei "Wo shi" jian zhu*, Beijing: Sheng huo, du shu, xin zhi san lian shu dian, 2009.

徐雁平，《清代世家與文學傳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Xu, Yanping. *Qing dai shi jia yu wen xue chuan cheng*, Beijing: Sheng huo, du shu, xin zhi san lian shu dian, 2012.

箱田恵子，《外交官の誕生——近代中国の對外態勢の変容と在外公館》，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社，2012。

Hakoda, Eko. *Gaikō Kan no Tanjō: Kindai Chūgoku no Taigai Taisei no Henyō to Zaigai Kōkan*, Nagoya: Nagoyadaigaku Shuppansha, 2012.

錢實甫編，《清代職官年表》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

Qian, Shifu, bian. *Qing dai zhi guan nian biao*, di 4 ce,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0.

羅光，《陸徵祥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Luo, Guang. *Luzhengxiang chuan*, Taipei: Tai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67.

(四)論文

王立誠，〈外交家的誕生：顧維鈞與近代中國外交官文化的變遷〉，金光耀主編，《顧維鈞與中國外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Wang, Licheng, “Wai jiao jia de dan sheng: Gu Weijun yu jin dai zhong guo wai jiao guan wen hua de bian qian,” Jin Guangyao, zhu bian, *Gu Weijun yu zhong guo wai jiao*,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chu ban she, 2001.

李文杰，〈晚清總理衙門的章京考試——兼論科舉制度下外交官的選任〉，《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北京，2011.03)，頁107-123。

Li, Wenjie. “Wan qing zong li ya men de zhang jing kao shi: jian lun ke ju zhi du xia wai jiao guan de xuan ren,” *Jin dai shi yan jiu*, 2011 nian di 2qi (Beijing, 2011.03), 107-123.

陳文進，〈清季出使各國使領經費〉，《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北京，1933.05)，頁271-310。

Chen, Wenjin. “Qing ji chu shi ge guo shi ling jing fei,” *Zhong guo jin dai jing ji shi yan jiu ji kan*, di 1 juan di 2 qi (Beijing, 1933.05), 271-310.

楊紹震，〈庚子年中俄在東三省之衝突及其結束〉，收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15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Yang, Shaozhen. “Geng zi nian zhong e zai dong san sheng zhi chong tu ji qi jie shu,” shou ru, *Zhong hua wen hua fu xing yun dong wei yuan hui*, zhu bian, *Zhong guo jin dai xian dai shi lun ji*, di 15 bian, Taipei: Tai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86.

**From a Scholar-official to a Diplomat:
Another Pattern of the Formation of Diplomats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Li, Wen-jie

Jounior Fellow, Si-Mi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his articles takes the experiences of Wang Daxi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an example to examine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diplomats unde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changing institutions. Wang Daxie, who was a famous diplomat during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was only a provincial graduate (舉人) at first. As an official he first assumed the post of secretary to the Grand Secretariat (內閣中書) by way of a donation (捐納), and then assumed the post of secretary to the *Zongli Yamen* - foreign office - (總理衙門章京) through an entrance examination. Afterwards he was promoted from from a lower level official in the *Zongli Yamen* to become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newly established Board of Foreign Affairs (外務部) owing to his rich diplomatic experience and having been secretary to the *Zongli Yamen* and an executive official (承政官制) in the Board of Foreign Affairs. His politics also changed from being loyal to the empire to prioritis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supporting constitutionalism. Wang Daxie's career was utterly unlike those of modern diplomats, who joined the diplomatic circle due to their training i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aws of Western countries. Thus changing career from being a scholar-official to becoming a diplomat is one way in which modern diplomats assumed their posts.

Keywords: Wang Daxie, diplomat, *Zongli Yamen*, *Waiwu Bu*,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